



责任编辑:程莉莉
新闻热线:(010)84151095
E-mail:grbnnmgzk@163.com

空调车票价为 154 元,却选择 68 元的绿皮车无座票;月收入六七千元,却为省下 300 多元,折腾两天几乎没睡觉

收入提高了,但勤俭节约的传统没有变

——春运绿皮车里农民工的故事

本报记者 叶小钟
本报实习生 刘友婷
本报通讯员 郑乐英

“多亏了这绿皮车,我只要花上 300 多元就能回到家里了!比起坐汽车,我能省下好多钱过年哩。”38 岁的邵兵拿着手里的火车票带着一口浓厚的湖北口音向车上的临时列车员说道。这一幕发生在 2015 年 2 月 10 日广州至襄阳东 3210 次的火车上。

2 月 10 日凌晨 3 时 35 分,满载着 1776 名外来务工人员人员的 3210 次动车组列车从广州火车站开出,驶往湖北襄阳东。这是广铁集团 2015 年春运开行的外来务工人员动车专列。

邵兵是湖北人,家在湖北十堰市竹山县宝丰镇牙子街,1977 年出生,在广东珠海市从事建筑工作十多年了。问及收入,邵兵笑着说,“我的收入还可以,每个月有六七千元,而自己每月只需要 1000 元的花费,其他都能往家里寄了。”

尽管收入有所提高,邵兵还是保持着勤俭节约的传统。他每天工作 9 个小时,没有节假日。“我是从珠海坐轻轨到广州南站,之后再坐地铁到火车站的,虽然折腾了两天没睡觉,但是比起坐汽车,我省了很多钱呢。”他笑眯眯地说道。原来,如果乘坐汽车回家,邵兵需要花费 700 多元,而现在只需要 300 多元。

在外面很节俭的邵兵,在十堰市竹山县却买了套八九十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月付 2000 元的按揭。他说,“如果家里父母身体健康,我也没什么事的活,这 2000 元还是很轻松的。”

火车上的另一位农民工也跟记者聊起了他的故事。43 岁的崔良看起来似乎有六七十岁,他是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朱集镇某村人,一家三口在广东江门潮连镇的一家五金厂打工。

崔良月收入三四千元,一家人大概每个月能赚七八千元。他告诉记者,他的工作比较累,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没有休息日。“我的票是在网上抢到的。”崔良说,“火车最实惠啊,我回家只要 68 元。”当列车员问道为什么不选择空调车时候,崔良坐在自己准备的小凳子上说,“空调车价格太高了,有没有座位没关系,能抢到票回家就好了。”他们乘坐的绿皮车里分为空调车和普通车,空调车价格为 154 元,而崔良的无座票只需要 68 元。

农民工维权案件复杂性逐渐增强,他们对社保、年休假等权益诉求正逐步觉醒,而用人单位侵权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

农民工依法维权仍是“老大难”

本报讯 (记者郑莉)“与 10 年前简单的欠薪相比,现在农民工欠薪案件越来越复杂,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2 月 9 日,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如是说。该中心 2014 年工作报告显示,追讨欠薪已不是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唯一案由,农民工对社保待遇、年休假等其他经济权益的诉求正在迅速觉醒。在该中心援助的案件中,单纯的欠薪已经成为“传统案件”,占比已经从 60%以上降低到了 20%左右,且农民工维权案件的季节性特征不再明显。

佟丽华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致诚农民工中心调研发现,如今,农民工法律援助已超越劳动争议范畴,在案件类型、援助对象、争议内容、法律适用和判决执行等方面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复杂性在增强。

据长期从事法律援助研究的王芳律师介绍,随着农民工维权意识的增强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实施,由劳动争议引发的行政法律援助案件正逐渐增多。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出国务工人员逐年增加,农民工跨

国劳动争议案件开始出现,涉及更为复杂的法律适用问题。

不过,与 10 年前相比,执行难依然是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的“老大难”问题。尽管法律法规日臻完善,但部分用人单位逃避用工责任的手段也不断“花样翻新”,并在执行程序上做起文章,拉长了农民工维权的周期。比如,农民工王某经历一裁两审终获胜诉,法院在对单位进行强制执行时冻结了法定代表人夏某的个人账户,夏某随即提出案外人执行异议,随后法院进行了执行异议听证并作出执行裁定,夏某又对裁定

不服再次起诉,案件经过两审方才尘埃落定。最终,王某耗时 6 年、历经两裁四审才拿到了欠薪。

值得注意的是,劳动侵权和争议案件引发的刑事法律援助正逐渐增多。致诚农民工中心发现,在经济困难、维权自救、受人胁迫等原因驱动下,一些农民工因为“不懂法”铤而走险,采取过激甚至违法手段维护权益。自 2011 年底至 2014 年 10 月,该中心共为 137 名农民工提供了刑事法律援助,其中 91.2%集中发生在 2013 年以后。

该中心执行主任时福茂分析认为,造成

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主要在于,劳动违法现象依然严重,同时,现有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畅,程序多、时间长、效率低,农民工往往难以承受维权成本之高而放弃权益或转而采取其他方式。

“针对劳动争议调处模式低效问题,建议修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并赋予劳动保障监察部门一定的强制执行权,将劳动监察变为劳动警察。”时福茂建议。

佟丽华则表示,培养一批职业化、社会化的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律师也尤为重要。

一家农民工法援机构的这十年

全国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职律师总数刚过百,仅相当于一个中等律师事务所规模,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法律社会组织发展速度,严重滞后于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和权利意识增强的速度

本报记者 郑莉

走进位于北京市丰台区的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一层接待大厅,一块红色牌匾分外醒目:“晓廊坊农民工讨薪四百万伸张正义,致诚公益律师维权尽职尽责名扬四方!”牌匾左下方工工整整签下了 112 个川籍农民工的名字。在该中心,这样的锦旗、牌匾有 400 多个。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作为我国第一家以社会专职律师为主体的农民工法援机构、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致诚农民工中心法律援助的成功经验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让我们先从“晓廊坊案”说起。这是致诚农民工中心办理过的农民工最多、欠薪数额最大的案件之一。

112 位农民工于 2011 年 5 月至 2012 年 9 月受雇于包工头周忠诚,在“晓廊坊”项目

商品房工地打工,被拖欠 400 多万元工资。他们多方反映问题,却被有关部门认定为“恶意讨薪”。于是,农民工们通过四川巴中驻京办事处找到致诚农民工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在公益律师的帮助下,112 位农民工将包工头和工程开发商荣盛公司、承包方中瑞公司一并起诉到法院。

2014 年 1 月,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支持广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即周忠诚和中瑞公司就劳务费承担连带责任,荣盛公司在拖欠的工程款范围内承担责任。一起曾被认定为“恶意讨薪”的案件,最终以 112 名农民工依法追回全部 413 万元欠薪告终。

翻阅致诚农民工中心的结案卷宗,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 2005 年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近十年时间里,该中心办结案件 9630 余件,涉及农民工 2 万多人次,帮农民工挽回损失超过 2 亿元。

作为致诚农民工中心创始人,全国律师协会法律援助与公益法律事务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佟丽华坦言,许多前来求助的农民工走过的维权路径十分相似:向政府、劳动、公安、信访等部门求告无果,在偶然中获悉法律援助,在工友推荐下找到了致诚农民工中心寻求帮助。“对于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工来说,依法维权与上访或违法也许只是一线之隔。如果没有法律援助或法律援助没有起到作用,也许就把农民工推向了另一条道路。”

比如李华意等 23 人案,在北京打工后,他们多次向包工头和老板要钱,可不但没有拿到钱,反而被老板赶出了工地。这些农民工向致诚农民工中心求助时,七八个人身上只剩下 3 毛钱。佟丽华先自掏腰包,借给他们 700 元,并和律师一起为他们的案件想办法。律师的关心平复了农民工激动的情绪,放弃了上访的念头,并最终通过调解和诉讼,拿回了 5 万余元工资。

“很多农民工欠薪案件都是群体性案件,如处理不当,很容易导致围堵政府部门、爬楼扬言自杀等极端事件。”佟丽华说,法律援助的作用,就是及时为农民工提供专业化服务,化解矛盾纠纷,引导农民工走上依法维权轨道。

10 年来,致诚农民工中心实现了一系列服务创新,包括在政府购买法律援助服务、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资助下,开展无偿法律援助服务;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农民工律师;延展服务领域,为农民工提供普法宣传和培训,并在北京市丰台区司法局的支持下,成立了“农民工普法学校”;调查取证先于受理,尽可能为农民工提供帮助等等。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秘书长胡占山认为,致诚农民工中心的经验表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可以通过建立专业性的公益法律社会组织予以弥补。

但据了解,目前我国从事农民工法律援

本报记者 郑莉

【人物档案】赵立红,48 岁,职业:建筑企业生产部长。2008 年 7 月,包括她在内的被拖欠工资的 118 名农民工,在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帮助下,经劳动仲裁、执行和解,最终拿到了总计 300 万元欠薪。

乐于助人的赵立红被工友们称作“热心大姐”。在工作之余,总会有慕名而来的农民工找她“咨询”,因为她有一个特殊的“才能”——懂法。

不过,赵立红说,“这是被逼出来的。”6 年前的她,也曾是被欠薪的农民工。

2008 年,赵立红在北京京藤幕墙工程有限公司生产部担任质量主管。当年年初,经营出现问题的公司开始拖欠工人工资。7 月,公司正式通知“无薪放假”。看着公司把库里的废料能卖的都卖了,加工车间的设备以及办公楼层也全部抵了账,已经“断粮”近半年的工人们急了,找到赵立红商量:“工作

没了,拖欠的工资是不是也拿不回来了?”赵立红心里也纠结。她遇事从来主张“以和为贵”,也会因为老板表现出的“倚重”而开心。她一度以为自己会在这家还不错的企业干到退休。可惜,这一次恐怕不能了。

那一年,恰好劳动合同法刚刚实施,赵立红找来法律仔细翻阅,发现以往老板给出的加班费远远低于法定标准。工友们大多来自农村,大字不识几个,更别说依法维权了。于是,赵立红和几个有些文化的工友开始帮 100 多个工人核算加班费。“工人的工资都是过生活用的,必须算清楚。”她说。

经过核算,公司拖欠工资、经济补偿金、加班费等加在一起,共有 500 多万元。“这么大一笔钱,怎么办呢?”几个人发愁了。

有一天,赵立红在网上看到了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现更名为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的信息,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工作站咨询。没想到,这次偶然尝试让大家“绝处逢生”。

接到赵立红等人的法律援助请求后,北京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派出时福茂等两名律师给予无偿法律援助。仅仅用了不到两个月,这场农民工炒老板鱿鱼并讨要拖欠款、经济补偿金、未签合同支付双倍工资等诉求的复杂官司就以农民工胜诉告终。通过和解,欠薪公司向农民工支付了 300 多万元。

跟着时福茂骑着破自行车奔波于企业、劳动仲裁和法院的赵立红,逐渐熟悉了依法维权的整个程序。她觉得,自己应该在帮助农民工兄弟提高法律意识上做点什么。

后来,赵立红在某小型私人建筑企业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管两个车间的生产。到了年底,她在为农民工核算工资时,注意

从被欠薪农民工到“义务普法员”

到企业没有为全部农民工上社会保险。如果在以前,赵立红肯定不会多管闲事。但现在她懂法了,知道这样会对农民工和企业造成恶劣影响。于是,她找到了老板“提建议”。“给职工缴纳社会保险,这是国家法律规定的,何况咱们是工伤高风险行业,万一出了事故,企业和职工都受损。”

赵立红这个“多管闲事”的建议,竟然被老板欣然接纳。公司对选择在老家上新农合的农民工,报销了所有款项,还为高危一线工人购买了意外伤害商业保险。

从此,赵立红多了一个任务:普法,时常向周围的工友,也向老板讲讲“法律怎么说的”。

其实,赵立红只是在致诚农民工中心帮助下,身体力行普及法律常识的农民工之一。“让农民工学会如何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

的,也是维护其权益最有效的办法。”时福茂说,致诚农民工中心曾经专门对农民工进行培训,但效果并不明显。有的农民工没有时间参加培训,有的人明感觉没兴趣,认为自己没被拖欠工资就不用学那么多,还有的认为法律规定太复杂,自己就是学了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而热心的农民工“义务普法宣传员”,原本都是曾被欠薪或受过工伤的农民工,在自己维权的过程中,对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等与农民工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所了解,具有丰富的依法维权的办案实务经验。“他们可以在工作岗位和生活中,结合亲身经历为身边的农民工普及法律知识,实现‘自己帮助自己’。”时福茂说,这些“普法员”也被农民工亲切地称为“赤脚律师”。

“黑哥们儿”有了年货

本报讯 (通讯员田丰 记者刘建林)2 月 10 日上午 9 点 30 分,随着山西兰花集团伯方煤矿年前最后一批矿工的升井,迎接他们的不但有明亮的阳光,还有大红的“福”字。这是晋城市总工会、市文联开展的“万福进万家”活动的一部分。

一位在伯方水厂工作的李师傅,想在水厂的大门口悬挂一幅具有特色的对联,编撰的上联为“文联圣手挥毫描伯方”,一时想不出合适的下联,工会的书法家为他对出了下联“工铁笔泼墨绘水厂”,并书写出来赠予这位老师傅。李师傅高兴地说,“这是今年最好的春联。”此次晋城市总、市文联共组织了 20 余位职工书法家,把对矿工的敬意、平安的祝福化为 500 余幅春联,300 多个福字送进了千家万户。

工友乘上免费顺风车

本报讯 (记者高柱 李娜 通讯员方炜)2 月 10 日,中建三局成都公司与四川汽车票务网联合开展的“春运顺风车”活动正式开启,首发免费班车自成都环球贸易广场项目出发,途经眉山、乐山、资中、资阳等多地,将 30 余名川籍农民工送至家乡,预计本次活动中将有 100 余名工友乘坐顺风车返乡。

困难职工获慰问金

本报讯 (记者程莉菊)为确保全系统所有困难职工都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新春佳节,中国人寿各级公司和工会按照集团的统一安排,普遍展开了走访慰问基层一线职工、为困难职工“送温暖”活动。集团工会从基层工会报送的困难职工中选取 100 位进行重点慰问,34 万元慰问金已于日前通过基层工会送到了困难职工手中。



板车娶新娘

天津开发区 1230 名外来工圆了大学梦

近千人学成后当起老板

本报讯 (记者姜明 通讯员姜书范)“没想到出来打工还能圆大学梦!”近日,在天津开发区泰达工地打工的山东籍外来工小何高兴地说。据了解,天津开发区为外来务工人员实施“圆梦计划”,三年来,已有 1230 名外来工拿到大学文凭,近千人次学成后转岗或创业当起了老板。

2012 年 5 月,为外来务工人员构筑上升空间,稳定产业工人队伍,开发区与南开大学签

署了《优秀外来建设者圆梦工程暨远程学历教育项目框架协议书》,采取企业推荐、员工自愿的形式,由管委会、大学和企业向希望提升学历水平的外来建设者提供资金资助和学习渠道。

“圆梦计划”提供的学历教育为专科和专升本两个层次。学习年限为 2 年半。学费采取政府资助 1/4、学校减免 1/4、企业承担 1/4、个人负担 1/4 的办法,使求学者的经济负担大大

降低。去年开发区“圆梦计划”吸引了包括长城汽车、三星电子、PPG 涂料等 30 多家企业的 693 名优秀员工报名,最终录取 555 人,相比 2013 年增加 164 人,招生人数创历史新高。

《尘肺职工“被骗”签订协议书 企业 30%赔偿款买断索赔权》追踪——尘肺职工请求撤销协议书 法院已立案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针对尘肺职工赔偿金“缩水”一事,2 月 9 日,33 名矿工到江西省乐平市人民法院办理了撤销《工伤赔付协议书》诉讼的立案手续。据该案律师王飞介绍,这距离 2013 年 4 月初次起诉,已经过了两年时间。其间,矿工盛有水已经病故,卢庭赛病情恶化,已经完全不能离开医院。

2014 年 8 月 7 日,本报曾以《尘肺职工“被骗”签订协议书 企业 30%赔偿款买断索赔权》为题,率先报道了江西省乐平市王水火等 30 多名尘肺职工工伤赔偿金“缩水”事件。此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对此事予以了关注。其中,2 月 8 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以《打折的赔偿金》为题再次将镜头对准这一事件。

此前,乐平法院相关负责人曾表示,“如果我们简单给他立案,按照诉讼程序走,可能矿工胜诉了,但是可能会拿到一纸法律空文。因为赵家山煤矿的现状是老的地方国有企业,基本上没什么可执行的财产。”但根据赵家山煤矿最新一份年检资料显示,该矿资产总额有 900 多万元,负债只有 30 多万元。

据记者了解,赵家山煤矿属乐平市地方国有煤矿,因生产达不到设计要求,造成严重亏损而停产,于 1996 年倒闭。后来煤矿改变经营模式,引进民间资金进行技术改造,煤矿恢复生产,期间承包人发生多次变更。目前,乐平市煤监局也已责令赵家山煤矿立即停产整顿,重新组织职工按照要求体检,未达要求,不得复产。

文字:杨召奎 制图:吴凡